

环境变迁: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

——《象之退隐》评述

黄齐东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伊懋可教授所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从中国环境变迁的角度来解读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结果导致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极限被打破。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过环境和资源的实际承载能力,人类必须正确处理眼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

关键词:环境变迁;环境;和谐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3-0078-04

风霜雨雪,四季轮回,日月同辉,万类自由。人与自然分别处在光谱的两端,然而其间重叠与互动则呈现出复杂的关系,伊懋可教授所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以下简称《象之退隐》)则试图从中国环境变迁的角度来解读这种复杂关系,该书2004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①。伊氏以象之退隐为始发,规划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模式”、“特例”和“感知”。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1]。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入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之中,成为社会构建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

一、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研究述要

无论是梭罗“瓦尔登湖”的召唤,还是柯勒律治“海崖松林”的涛声,都反映了浪漫先贤对自然的膜拜与敬畏。简·博丹的《论共和国》主张地理环境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这种“环境决定论”在查理·孟德斯鸠所著《论法的精神》中得以更为直接的体现。亨利·亨丁顿考查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后,发表《亚洲的脉动》一书,认为居住地气候变干旱和牧场条件日益变坏直接导致了

十三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外迁。决定论思潮虽然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如反对唯神史观和君主专制制度,但这种简单的外因论并没能给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提供合理的解释。

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环境可能论”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为自身服务。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恰恰是从“环境可能论”止步的地方起步,反思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的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以此来认识人们对待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伊懋可延续了这一思路,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环境有自己不可抹煞的故事,但是必须由真诚的作家来阅读和重述。伊懋可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提倡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因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

收稿日期:2012-06-14

作者简介:黄齐东(1974—),男,江苏南京人,副教授,从事环境社会学及环境变迁等方面的研究。

①伊懋可(Mark Elvin),当代著名的中国环境史和经济史专家,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1968年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2—1989年在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史并担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多年,从1990年起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任中国史和亚太区域史教授和召集人。发表《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目前尚未有中译本)、《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等。

和灾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

二、环境困境的全球压力与现代人类的精神失落

2011年11月2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哥本哈根发布了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可持续性与发展:共享美好未来》^[2]。报告告诫我们,环境污染、森林砍伐和海平面上升已经危及亚太地区许多岛国的发展,而为了维持目前的发展速度,南亚地区则不得不解决极端贫困和国内不平等问题。该报告指出,通过在世界各国同时解决健康、教育、收入和性别不平等方面的问题,便可以有效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环境挑战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的快速发展,而森林砍伐则加剧了亚太地区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现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指出:“人类发展报告记述了过去几十年来人类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但如果我们不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有力措施以减少环境危机和不平等现象,人类的进步将难以继续”。

在对自然的改造中,人类以技术为手段,从单一的工具、技能、技巧发展到具有庞大规模的技术体系,深入到人本身所无法直接触及的自然领域,使人类从完全依赖于自然,顺从于自然的被动地位中解脱出来。每一项技术进展,从锄头到核反应堆,都对环境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现在可谓达到危险的地步,甚至可以称为环境困境。所谓环境困境,主要是指由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导致生态结构与功能的破坏和生命系统的瓦解,从而危害人类存在的现象。2010年4月,墨西哥湾沉没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已经导致前所未有的环境灾难,每天有5000桶石油通过破损的管道流入了墨西哥湾,大约4000多km²的海面被泛着泡沫的黑色石油所覆盖,美国政府已把墨西哥湾钻油台漏油危机列为国家级灾害。人类生存的自然发生了多种变化,这些变化中除了朝着人所需要的方向变化外,也出现了违背人类意愿的变化。如水陆全面污染、资源成倍损耗、全球气候异常、臭氧屏障趋薄、海水逐年升高、自然灾害频发等。正是这些困境的存在和日趋恶化,人的生存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才需要反思人的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以此来改良人们先前的价值观念,调整人的行为活动。

这种环境困境的前兆与信号,在《象之退隐》中已有所提及:大象从东北向西南方持续退隐。其原因并不是气候变冷。因为在气候回暖之时,大象并未在长江与淮河流域之间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才是象之退隐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集约化与人口的聚集导致森林环境破坏;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免受糟蹋而消灭大象,为了获取象牙和象鼻,或者驯养用于战争、运输和各种仪式而猎获大象^{[1][31]}。在自然资源被商品化的时期,即使是国家也不得不依赖市场的运作,自然环境就会蒙受更大压力。国家驱动并不是国家掌管一切,市场和利润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环境困境已愈发严重。以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杰作”的酸雨为例,它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它造成了土壤肥力减弱,植物枯死,生物产量下降。一旦江河湖泊失去缓冲力,便会加速酸化和生态的恶化,接踵而来的变化是有毒金属的增加,水中生物受到影响,生态系统变得更为脆弱,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大象撤退并不是故事的结束,现代人类的精神失落才是悲剧的发端。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扩张的动力并不是由于资本金的来源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产生于新教伦理的、把职业当作“天职”的精神信念。丹尼尔·贝尔却揭示了这种精神家园失却的进程。他认为随着宗教力量感召力的减弱以及社会世俗化的发展,韦伯所概括的曾是资本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的新教伦理逐渐沦丧,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与社会的疏离,换句话说,人们在失去自己的家园的时候,也在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被誉为“美国文学源头”的爱默生在其著作《论自然》中明确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工业社会已引起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同时也带来了双重痛苦:自然环境的退化和精神家园的遗失。然而,对这个巨大转变的悲剧性嘲弄在于消费者社会的历史性兴起对于损害环境有着重大影响,却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一种满意的生活。

无论是“罗马俱乐部”的悲观思潮,还是美国赫德森研究的乐观主义^①,都在反思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定位。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演化从单向服从到具有对抗性质,并非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改造活动已达到了极限。从主体方面看,人的自然潜能和社会本性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从客观方面看,

①罗马俱乐部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罗马创立。创始人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总裁贝切伊。其宗旨是:探查、发现人在这个全球王国的状况,忠实和深刻地阐明人类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为人类在同现实状况进行搏斗时采用和实施的战略和措施提供帮助;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思为代表的乐观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人口增长、经济开发、环境等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坚决反对“零的增长论”,认为增长即使有极限,也不是物理性的极限。

自然界的客观多样性也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和恰当的利用,人和自然都保留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充分的发展潜力^[3]。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出现,正说明人所需要发展的技术控制自然的能力和対自然规律的认识存在缺陷。人类似乎已经失去了亲手触摸四季变化的勇气,亲耳倾听天籁之音的冲动。他应当重新记起那光芒四射的正午,以及色彩斑斓的拂晓和黄昏。

三、人与自然——环境问题的实质与核心

在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每一次突破几乎都离不开对人在自然和社会中地位的重新解读和定位,更离不开对终极关怀的追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本身从自然而来,并且产生之后仍然具有自然属性,仍然受自然界整体规律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自然界的一员,人不能消灭自然规律,也不能改变自然规律,而只能按照自然规律去行动,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存。这是人对自然的“非超越性”,即不可超越性;另一方面,自从人产生之后,就形成了主体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形成了一种超自然的进化和发展方式。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属性,因而人也成为一种“超越性”存在。

1. 自然价值的整体主义转向

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定位的论战中,人类价值中心论和自然价值中心论是争锋最为激烈的两个流派。前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区隔,突出人的精神和力量,单方面强调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主体性,忽视了自然环境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制约和限制,导致了人类认识和实践的狭隘性和短视性;后者突出自然的价值体系和影响,使人类重新反思、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全球性的环境和资源危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忽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深蕴着一种极端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解决环境危机的思维方式。摆在面前的依然是矛盾冲突的爆发和人类的最终毁灭。

伊氏在《象之退隐》中表达了与上述绝然不同的第三种思维,即个体的价值往往是通过系统的价值来体现的,个体的价值须在系统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中体现。《象之退隐》展示的是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特性,但这种内在价值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具有联系性、外显性和集群性的,每一种内在价值都由自身固有的价值和它所朝向的价值构成,这使得个体相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又具有工具价值。因为只有在生态系统中,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才得以产生和发展。基于这种价值体系,《象之退隐》强调的正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发生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不研究这一部分,就不能写出完整的历

史。反过来,如果研究了这一部分,写出来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这种纯粹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象之退隐》突破了流行于现代西方以人的主观偏好为标准的价值论框架,使价值延伸至人之外的自然界。传统道德学说之所以在道德关怀上止于人类,无非是因为人类身上披戴着内在价值的光环,而自然物则被无内在价值的黑洞所吞没。

伊氏的这种思维源于系统论的思维背景,即整体优先于个体,生态系统优先于个体生命,但同时,并不是完全无视个体生命,而是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体性的出现,并以偶然性和历史性来表现个体的独特性,创造出绝不不同的个体。伊氏的《象之退隐》把关心的焦点从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从而实现自然价值的整体主义转向。这种转向实际上在罗尔斯顿有关生物个体(包括人类)与自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当中已有所体现。罗尔斯顿将整体主义限定在人对自然的环境伦理当中以及与环境事务相关的人际伦理之中。人类对生态系统具有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人类要遵循生态系统的规律,承认动植物和其他物种的权利,尊重一切生命。

在这种整体主义范式的关照下,《象之退隐》所提及的自然中固然存在的悲剧性现象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作为破坏性力量出现的海啸、地震、火山爆发等,与建设性力量是并存的。从自然物质循环和生命进化的角度看,建设性力量不断征服破坏性力量,个体的悲剧被整合进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进化过程中,生命进化是自然的基调,这就是自然之美。

2. 自然权利的全面救赎

传统意义上,权利是属人的。权利不是被给予的东西,而是通过其正当性得到社会承认,而被逐渐获得、扩大、形成的东西。因此,谈论自然权利的却往往会遭致令人不可想象的发难,如杰里米·边沁声称这种提法“毫无意义”,谈论自然的权利是“装腔作势的胡扯”;美国的沃特森更把自然的权利视为生态宗教,是反人道主义和厌世主义。但这种批评能促使人类更深入地审视权利的涵义,从而给自然权利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契机^[4]。

所谓自然权利就是自然有着按照自然当理之理的生存资格或利益。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权利,是人不可否认的“天赋权利”;而当权利作为法律道德范畴时,它是指人赋予自然的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这是一种人必须承认的“人赋权利”,它具有人的主观性。自然所具有的这两大类权利,虽然来源不一,但却系于一身,并应为人所尊重。自然权利是自然意志的体现,是客观生态规律的当然之则。

自然权利与人类权利的对立。其矛盾性在于:“人权”要求利用自然满足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可能

性与自然要求人类要对它履行道德义务的合理性之间总是存在不一致,也即人的生存权与(自然)物的生存权是矛盾的。但是这些差异性和矛盾性不能否认“自然拥有权利”命题本身。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象之退隐》的重要内容。

3. 自然演进与社会发展的契合

人与自然有着本质区别,但这种区别具有相对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和相互作用显得更为重要。《象之退隐》收集了独特的史料(诗歌、传教士回忆录和多种语言研究成果),将环境变迁、经济发展、科技进化有机结合起来,使用了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完整的自然观不是关于纯粹自然的观点,而是包括了人和社会因素在内的自然观。因而,人类在获取自己利益的同时,必须依照、遵循自然规律,同自然的利益并肩和谐发展,由此建立起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5]。

《象之退隐》使得人们进一步思考自然演进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社会发展全面地干预着自然界的整体优化发展。因而,人类必须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单纯地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去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从总体上来把握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们经常会自觉地默认那些能够带来更迅速的物质享受以及财富增长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在这样一种“缺省配置”之下,出现了“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概念,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只是用这样的口号作为一种标签或装饰,而在装饰背后却坚持着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坚持自然演进与社会发展的契合是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不以牺牲环境、生态换取社会发展,不走“先破坏再治理”的老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写出了滥用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给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带来的灾难性后果^①。卡逊和她的书所质疑的,不仅是滥用毒药,更是工业化、技术化社会对待自然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陈桂棣《淮河的警告》沉痛地批判淮河的环境变迁:“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淮河流域一百九十一条较大的支流中80%的河水已变黑变臭,三分之二的河段完全丧失了使用价值。《淮河的警

告》在人与环境的大背景下,描绘出一幅充满着悲哀与希望、交织着邪恶与正义的淮河图^[6]。哲夫的《黄河生态报告》是反映并批判黄河水污染现状和水土流失的权威性作品。从黄河源头走到黄河入海口,行程上万公里,纵横八省区,表达对深受污染的母亲河的痛惜^[7]。事实上,这种态度和行为已经损害了自然的生存权、自主权和捍卫自身的权利,从而最终影响了人类发展的相关权利。

四、重拾《象之退隐》所承载的自然精神

1904年,当亨利·詹姆斯来到爱默生的故乡康科德河畔时,他感慨万千地说:“撒落在我身上的不是红叶,而是爱默生的精神”。在论述自然的本质时,爱默生提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象征物,在自然界的背后,浸透着自然界的一种精神的存在……自然界不仅向人们揭开了物质规律,而且还能启示道德真理”。自然固然给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支持,但是这是自然的最低级作用。自然的更高级的作用是精神方面的。

重新打开《象之退隐》,耳边想起的是大象撤退的沉重回声。维护和推动人与环境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协同进化。

参考文献:

- [1] ELVIN M.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可持续性与平等: 共享美好未来. [N/OL]. [2011-11-2] <http://ch.undp.org.cn/>
- [3] GUHA S. Health and population in south asi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M].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1: 24.
- [4] MANN H H. Land and labour in a deccan village I: pimple saudagar [M]. Bombay: University of Bombay, 1917: 132.
- [5] POMERANTZ K.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n the eve of industrialisation: Europe, China and the global conjuncture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2 (2): 425-444.
- [6] 陈桂棣. 淮河的警告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21.
- [7] 哲夫. 黄河生态报告 [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12.

^①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家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成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力的书之一。戈尔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作的序中说“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仅至1962年底,就有40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